

結論

前言

張學良在 1950 年後半期台灣，撰寫四篇自敘。那麼張撰寫的機制以及目的是甚麼？本文是透過探討四篇張學良自敘，即其特色可以形容為「應用正統性」、「顧慮正統性」、「套用正統性而驗證」、「同化於正統性」的四篇，而已經得到「張學良為了主張自己過去的有用性而撰寫自敘」之結論。現在擬重新整理從本文各章得到的小結來進行綜合性探討。首先提示張學良自敘共通的機制，其次將之由具體的四篇自敘而進行確認，最後由此提出張自敘的「正當的正統化」此一方法。

一、張學良自敘的機制

本文注意到在四篇自敘中所定位的登場人物（主角）張學良扮演的角色，由此把握而理解兩個敘述者的存在，即兩個都主張「過去的有用性」的敘述者。第一個敘述者主張在過去自己行爲中的有用性。此際，敘述者將現在自己的存在意義，尋求於一個曾經實行正當行爲的過去自己。對此，第二個敘述者是將自己過去視爲失敗。敘述者主張從自己過去的失敗經驗得來的教訓在現在所發揮的有用性。此際，敘述者將現在自己的存在意義，尋求於一個向同一時代世人就可以提示教訓之現在自己。同一時代世人是被權威視爲敘述者的過去是失敗的。另外本文經過探討張學良撰寫的當時生活背景，而且由於與同一時代「黨國正史」（其特色否定張學良）的比較，來明確他的撰寫自敘是被蔣中正強迫的，而且所謂讀者是特定爲蔣中正。因此從「黨國正史」的形成這一觀點來看，我們亦可說，張學良自敘的真正作者是蔣中正，也不爲過。還有也明白了，張的自敘性記錄是受到撰寫當時時代背景相當深刻，因此相當困難作爲一個歷史事件的傍證。

二、應用正統性

在第一自敘〈西安事變反省錄〉（1956-57 年）中，登場人物自己扮演一個角色，即作爲蔣中正的部下誠實邁進國內統一、一致抗日的實現。從此發現的敘述過去自己的敘述者立場是，主張自己在過去對國家曾經表現的有用性之立場。同時登場人物張學良是被描述作爲一個敘述者認爲正當的思想之強烈抗日意識的人物。而且敘述者爲了對這些人物的行爲賦予正當性，同時應用敘述者同一時代「黨國正史」的架構而敘述之。敘述者敘述的重點在於抗日，本來「黨國正史」所重視的國內統一是，變成爲爲了抗日的一個過程。在此，過去的自己是肯定地被描述，敘述者也是積極地進行敘述。敘述者將自己認爲正當的自我形象投影於登場人物的過去自己。因此本文將之稱爲敘述者的正當立場。

與此不同，敘述者另外也有否定地敘述過去自己以及尤其現在敘述者本身。這些敘述者的出現，是特別在回憶西安事變的場面。在此，敘述者首先將自己過

去視為「禍」。敘述者將「禍」的原因尋求於自己心裡曾經存在的不安定性，而進行自問自答。然後敘述者將過去失敗的經驗作為一個教訓，提示於敘述者現在所屬的國家之反共鬥爭政策。由此，敘述者主張從自己過去得來的現在有用性。可是，敘述者敘述的重點是在自我省察而不是在提出教訓。反正，如此反省或提出教訓是，作者張學良被他者強迫的形象。所以，此敘述者是對應於權威所具有的正統性。因而本文將此稱為敘述者的正統立場。

以上可以確認，在〈西安事變反省錄〉此一自敘中，存在兩個主張過去有用性的敘述者。而且此自敘的特色可以形容為應用正統性。可是，作者張學良的真意是在正當敘述者或在正統敘述者？實際上可以解釋為兩樣。因此只有針對〈西安事變反省錄〉一個內在完結的小宇宙，相當困難判斷。對於過去有用性，一方面肯定過去（與現在），另一方面否定過去而且肯定現在。擁有如此矛盾的就是，〈西安事變反省錄〉。

三、顧慮正統性

在第二自敘〈雜憶隨感漫錄〉（1957年4月）中，也可以發現正當敘述者與正統敘述者的存在。在此自敘中，作為登場人物來被描述的過去自己，是擁有各種各樣的角色。對此，本文方便上分成為四種，即觀念性自我（理性主義者、良心人物）、社會性自我（權力者的兒子、當政者、軍人）、國族主義自我（張家之子、東北人、中國人）、正統自我（國民黨員、蔣中正的部下）。過去自己扮演多種角色，而且自己行為的正當性是，由於圍繞多種自己的每個狀況之酌量情形的邏輯而保證。同時，多種自我形象雖然看起來是沒有秩序，但實際上是由於「為了救國」此一行動準則來決定希求角色（role expectation）的優先順序。救國此一行動準則是，一方面意味著自己認為是正當的抗日，另一方面因顧慮「黨國正史」而意味著國家統一。敘述者敘述的重點在於抗日。反正在此，正當敘述者主張在過去自己行為對國家發揮的有用性。

另外，在敘述西安事變的部分，正統敘述者還是出現的。現在的敘述者自己本身變成為正統敘述者所敘述的對象，即登場人物。在此，敘述者還是將從失敗經驗得來的教訓就提出於現在國家政策（反共抗俄），其敘述的重點還是在於尋找過失所在，即自己省察。

以上可以確認，兩個主張過去有用性的敘述者，都存在於〈雜憶隨感漫錄〉。而且，此自敘的特色是，形容為顧慮正統性。正當與正統的兩個敘述者的關係，還是與前一個自敘一樣矛盾性的。可是，「黨國正史」因素對敘述者立場的影響也變成稀薄了，由此可說，作者對正統性的對應是從「應用」改變到「顧慮」。所以可以推測作者張學良的真意或許在於正當敘述者，而且若經過比較於〈西安事變反省錄〉，就更容易推測之。

四、套用正統性而驗證

如上兩種自敘給我們的印象是，正當敘述者的優勢，對此第三自敘〈恭讀《蘇俄在中國》書後記〉（1957年8月）給我們相反的印象。主要的登場人物是正統敘述者自己本身，此際他的過去成爲由失敗經驗得來的現在教訓。如此正統敘述者提出的所謂團結的重要性此一教訓，其目的是使用在現在國家政策的反共抗俄此一目標上的。在此，教訓的意思重點從自我省察的材料改變到向國策的活用。因此可知，正統敘述者的敘述自己歷史，是由於套用「黨國正史」的《蘇俄在中國》而驗證。

另外，正當敘述者的存在，由於敘述到曾經儘力於國家統一的登場人物，而可以確認。但是正當敘述者的敘述是獨立於整個自敘脈絡。另外在前面兩種自敘中敘述的重點在於抗日，可是在此改變到在於統一。其原因是，同一時代的正史《蘇俄在中國》將近代中國史明確定義爲安內攘外（先統一、後抗日）。因此正統敘述者的敘述脈絡吞併正當敘述者。此自敘的特色可說是由套用正史而驗證自己過去的是非。

五、同化於正統性

最後的〈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1958年），或許與其是自敘，不如是告發書。登場人物是告發自己受害體驗的正統敘述者自己本身。敘述者嘗試由於告發，而將自己過去的有用性標示於現在國家政策的反共抗俄。

另外，正當敘述者雖然有存在但是幾乎沒有出現而且若出現也沒有發揮本來意義。此敘述者只敘述，過去自己曾經扮演了在西安事變場面中保護蔣中正之角色。在此，過去自己的表現有用性的國家，就不意味者是需要抗日或統一的國家，而意味者是蔣中正本身。

從而此自敘的特色，可說是同化於正統性。

六、正當的正統化

總之，四篇張學良自敘都是由於正當敘述者與正統敘述者主張過去有用性，來擁有矛盾而構成的。也就是說，以時間的順序來看，兩個敘述者的關係在第一自敘形容爲應用正統性，其次在第二自敘就形容爲顧慮正統性，而正當敘述者優勢的。但是在第三自敘中，由於「黨國正史」的套用並驗證的特色來改變爲正統敘述者的優勢。最後自敘中，其傾向更強化，而由此兩敘述者的敘述就同化於正統性。總之可言，張學良在自敘中使用「正當的正統化」此一方法，來主張自己過去的有用性。這是張對自己歷史敘述的機制以及目的。張學良就是，由於對應一套擁有正統性的「黨國正史」，而將自己認爲正當的歷史認識，加以正統化而且鞏固其敘述的妥當性基礎。這張學良思想活動，我們可以理解爲兩樣，即張對「黨國正史」的挑戰的失敗結果，或是其對之迎合的成功結果。因此本文將此兩聲性

敘述，稱為敘述者張學良的「雙重面相」。

1950 年代張學良根據權威的正統性來保證自己敘述的妥當性基礎，那麼在國家對個人強迫認同官方歷史解釋的戰後中國（現代中國）時空上，張的如此思想有甚麼意義呢？本文擬提出今後的課題。第一擬把握現代中國的二大「黨國正史」，即國共兩黨的「正史」，以及其演變。第二擬把握被強迫參與創造「黨國正史」事業的人物，尤其是其自敘。現在暫且舉例如下人物以及其自敘，即張學良、愛新覺羅溥儀（在共產黨政權下撰寫自敘，亦有日記與法廷證言。另外其弟溥傑亦有自敘與日記）、馮友蘭（在共產黨政權下的『中國哲學史』多次修訂。自我檢討報告的多次撰寫）。由此可以理解在現代中國此一時空下人們面對甚麼問題而且如何試圖克服。從此可以提示一個闡明它的研究方向。

然後由此可以將中國近現代思想，作為一個組織性的而且以 1949 年為分歧線來區別。就是說，在近代思想有一個傾向性，即面對中國特殊性如何的國家層次問題。換言之，其思想課題是，中國如何對應外國，或近代中國如何對應傳統中國呢？另外，在現代思想有一個傾向性，即面對每個人特殊性如何的個人層次問題。換言之，其思想課題是，個人如何對應國家，或其相反。反正近代也好，現代也好，在中國的人格主體，不管國家或個人，都必須思考特殊性。而且如何理解特殊性，這是現代世界史上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般問題意識。所以由此可以定位近現代中國思想在世界史上的意義。